



如果没有金融，7000年人类文明将要改写

美国金融史学家威廉·戈兹曼新著《千年金融史》告诉我们的事

严杰夫

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人类世界已很难离开金融而正常运作，只是很少有人能讲清楚，金融究竟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对很多人来说，金融是个极度抽象的东西。大家第一时间谈到金融时，总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数字、金钱、资本、货币等等符号。所以，似乎金融这个东西，我们并不陌生，但却又感觉有些遥远。

美国金融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戈兹曼的新著《千年金融史》倒是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他通过梳理7000年以来的历史，详细阐述了金融是如何逐步改变了人类文明面貌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戈兹曼笔下，金融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的。与许多人类的智慧一样，也正是有了“金融”，7000年的人类文明才能不断书写下一页页辉煌的篇章。

这些投资者不直接参与公司的运营，而是凭借股权来获取利润。这与今天我们的股份公司的形式极为相像。

更有趣的是，这些包税人公司的股权是可以流通的。而这些股权的交易场所，就在那些著名的古罗马神庙的门口。在今天的古罗马广场中央，仍然耸立着由一根檐板连接的三根科林斯立柱，那里是卡斯托尔和波吕科斯神庙的遗址，这里的演讲台和通向神庙的台阶遗迹依然清晰可见。戈兹曼认为，这些地方显然就是民众交易包税人公司股份、竞拍政府合同的场所。所以，当今天的游客经过这些遗址时，或许会惊讶于这些建筑物壮观的外表，也会好奇于这些建筑细节之处隐藏的有关古罗马神话里的那些传奇，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其实正在参观世界上第一个股票市场，更不会有观察到，这些神庙具有的三角形的装饰带，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正门极为类似。

戈兹曼指出，包税人公司出现的意义在于，人们通过包税人公司这种新的金融工具，可以来隐藏投资或进行标准化交易。尤其是对于被禁止从事商业活动的元老院议员来说，包税人公司也就成为他们维持财富规模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包税人公司只是罗马时代纷繁复杂的金融体系中的零星一角。我们或许会发现，包税人公司与今天的股份公司极为相似。但其实，罗马时代的整个金融系统可能已经具有我们今天金融系统的大致模样。因此，戈兹曼才会指出，“有时以现代视角考察罗马金融系统，会觉得非常熟悉。”



▲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映出欧洲金融的倒影。图为根据这一名著创作的同名绘画作品。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诞生的地，考古学家发现了人类最古老的文书——乌鲁克泥板。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记录的是产品和大宗商品交易的会计凭证。

▶诞生于中国北宋年间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游览古罗马广场中央的神庙遗址时，人们其实正在参观世界上第一个股票市场。

更为复杂的金融产品渐渐出现，引发不休的争论，却也带来惊人的改变

而随着17世纪启蒙运动的开启，金融领域也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金融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工具，而且还涉及



到了社会和哲学层面的主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复杂的金融产品出现了，这些产品很多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可能就是年金产品。

在戈兹曼看来，近代欧洲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正是年金合同（即养老金）。通过年金合同，公民将个人或家庭的风险转移给了国家，政府将无数个家庭的风险集聚起来，让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与以往历史上的金融产品不同，年金合同面对的是未知的未来，它是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金融产品，本质上是人们用来管理未来风险的工具。

年金合同背后的哲学逻辑在于，将个人的风险集中到国家层面，再在未来某一个时候，分摊到国家所有成员身上来共同承担。也就是说，当个人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时，个人是单个的社会个体，而当个人加入到年金体系之中后，则成为了国家集体的成员。也正是因为这个逻辑的存在，使得有关年金产品的辩论成为现代金融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话题。

在年金问题上，阐述最为深刻的要数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在他那本巨著《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中，他把养老金看成是金融与概率思想的完美结合。他指出：“不平等的事，

有可能通过以概率应对偶然的方式被大部分消灭。这样一来，就可以保障人们年老之时会得到补助……这将让社会从周期性的崩溃，以及腐化和贫困得以永生的根源之中解脱出来”。据此，孔多塞预测，因为有了养老金，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与孔多塞的乐观态度不同，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却把这种乐观看作是天真。马尔萨斯认为，当一个社保体系能够消除资源对人口扩张的限制时，将会导致死亡率降低和人口增长率的提升，人类的工作积极性也将随之减弱，与人口增长有关的经济增长也将放缓。所以，马尔萨斯认为，基于终身年金方案的社保体系注定要失败。

从孔多塞和马尔萨斯开始，有关社保体系的争论至今还未停息，而由概率和复利构成的数学体系却成为了道德哲学家们探索人类可能性和局限性的智力工具。200年后，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个话题做出了回应，那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观察到，市场是由人类的“动物精神”驱动的，这种“动物精神”在今天被称为非理性的市场心理。他认为，正是存在着这种能够影响经济的强大潜在力量，政府就可

以利用这种力量改变宏观经济的平衡。同时，经济被管理得当，投资者就只会是一种暂时的存在，一旦充分就业成为常态，那么富翁、囤积者和资本家就会变得不重要，“食利者以及无用投资者的安乐死，一点也不意外”。于是，凯恩斯认定，个人投资最终将让位于公共储蓄，国家将管理我们的存款，使其达到充足状态。

今天来看，孔多塞和凯恩斯对国家的信任是有理由的，他们关于金融让未来更美好的梦想在21世纪正在接近实现。而凯恩斯有关国家投资将取代个人投资的预言也正在变成现实。这些规模巨大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也被戈兹曼看作是当代金融的重要创新。

很显然，未来金融技术对人类文明的改变还将继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金融的反思和争论也迎来一波新的高潮。再加上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金融世界的面貌或正经历一波新的变化。这一切，在戈兹曼的书并未涉及到，也因此《千年金融史》很难说画上了句号，其中的许多结论也并非是我们的最终答案。就好像，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替代个人投资的，并不是凯恩斯所预测的国家政府，而是人工智能吧！

(作者为书评人)

根据史料记载，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区域内分布着大大小小200多家银行，被誉为“东方华尔街”。而上海历史上的多个“之最”也由金融行业创造。

首家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诞生于上海

现在人都知道，如果在银行的信用记录不良，申请贷款可就成问题了。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债务人是否有信用全凭道德自律，直到信用调查机构的出现。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征信所，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创办的此类机构，催生其成立的导火索是1931年发生在天津的一场金融风波。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天津有一家协和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公司负责人叫姜东曙，是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段祺瑞的女婿，在天津商界可谓“路路通”，很吃得开。各大银行、钱庄趋之若鹜，争相放贷给他。但这姜大公子乃是一名纨绔子弟，没啥真本事，不善经营，又喜欢摆排场、装门面，出手阔绰。时间一长，公司开始走下坡路，最后竟宣布破产。协和公司倒闭后，与之有关的银行、钱庄损失惨重。比如，中南银行天津一家分行，在该公司倒闭前一天，还放款40万元，加上以前贷出的180万元，共计损失220余万元。当时，整个天津金融市场岌岌可危。消息传到上海，各大银行极为震动。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马上成立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帮助金融业同行了解市场的变化及债务人的信用。

据档案记载，中国征信所采取的是会员制，按期收取会费。会员得到的回报是可阅读征信所的参考资料，如有需要还可委托征信所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当然需另外交纳费用。非会员也可委托调查，但费用高出会员许多——会员的调查费用，一般每次1元，非会员则在10元左右，英文报告再加4元。

征信所调查人员的素质颇高，堪称百里挑一。应聘者必须具备“商业经验、流利口才、诚挚态度、机变能力、耐苦精神、商是常识”等六项条件，缺一不可，凡染有赌博、懒惰等不良习气的人，一概不用。征信所人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但专职调查员仅10余人，每人要负责数个甚至数十个行业的委托调查。面对如此大的业务量，人员根本不够，为此征信所还聘请了大量的特约调查员。许多专跑经济的记者，成了征信所的兼职调查员。一些行业内的资深人士，也受聘担任咨询工作，如棉布业的叶笑山、花纱业的穆藕初、绸缎业的蔡声白、化学业的方汝仙等。

征信所成立后不久，便提供了那万生商号的经营情况报告书。该店是知名老字号，向来声誉卓著，但一段时间因经营不善，出现亏空隐患。征信所了解到情况后，及时通报会员银行，减少了他们的损失，在业内获得好评。据统计，开办半年后，征信所已有基本会员29家，普通会员67家。后来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沪上中外银行、钱庄陆续加入，截至1935年底，征信所已有会员154家，其中包括30余家外国银行及洋行，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卜内门洋行等。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许多工商企业或迁往内陆地区，或毁于日寇的炮火，信用调查失去了依托。勉强维持至上海解放，中国征信所宣告结束。其历年积存的上千卷行业、公司和个人调查报告书，现在全部保存

上海的金融春秋

在上海市档案馆，成为近代上海极富有历史价值的一座资料宝库。

金融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不只是跟钱打交道，它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以及百姓的生活休戚相关。近代历史上，银行家为海派文化增添了温暖的底色。

藏书丰富、名贵的“学者之家”——设在番禺路209弄16号的海光图书馆，即是由银行家创办的。它的创办者是被誉为“中国摩根”的著名银行家陈光甫。陈光甫视海光图书馆为他一生事业的“三大杰作”之一，另两项，是他一手创办的上海银行与中国旅行社。

早在1923年，陈光甫就将自己的私人藏书悉数捐出，在上海银行内开辟了一间图书阅览室，供员工借阅，1927年正式成立上海银行图书馆。为实现图书馆以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为主、向公众开放的设想，1948年陈光甫将其改名为海光图书馆。除在国内搜集善本佳槧，陈光甫还花大量外汇直接从国外购入哲学、经济、文学名著，德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也在其列。与此同时，该馆还每半月举办一次报告会，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做演讲。

同样出自银行家之手的还有众合图书馆。创办者之一叶景葵是近代金融界当之无愧的元老，他掌管的浙江兴业银行是我国金融史上最早实行董事长制度的银行。虽然长期与金钱打交道，叶景葵骨子里却充满了文人气质。据记载，为赞助筹建众合图书馆，他捐献了价值5万元的股票基金和三万多册藏书。图书馆位于长乐路746号，为方便阅读和整理图书，更为了保护图书免遭不测，叶景葵干脆在图书馆旁边另建小屋居住，整日与书相伴。

建造国际饭店，是金融业涉足房地产业的一个成功案例。位于南京西路黄河路口的国际饭店是上海年代最久的饭店之一，有1930年代“远东第一高楼”之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它是由金融机构投资建造的。1930年，由上海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组建的“四行储蓄会”，以45万两白银的代价，购进位于上海市中心跑马厅对面派克路（今黄河路）上二亩七分多的一块地皮，开始兴建国际饭店。这是中国人自行投资建造的第一高层建筑。

金融朋友甚至在艺术创作上为梅兰芳出谋划策。梅兰芳《宇宙锋》这出戏，便是中国银行总文书、人称“吴二哥”的吴震修从前人笔记中找出来，由齐如山执笔、经诸人精心打磨上演后大受好评的。另一部梅兰芳久演不衰的戏《霸王别姬》，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同样倾注了吴震修大量的心血。这部戏先是齐如山执笔，初稿完成后，场次很多，要两天才能演完。吴震修认为戏份太长，可压缩到一天。但齐如山不乐意，两人因此发生争执。吴震修干脆将本子带回家，亲自操刀，将本子改得人人叫好，齐如山十分叹服，两人又重归于好。

事实上，梅兰芳身边有一大帮子金融界的朋友，包括冯耿光、史量才、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等。电影《梅兰芳》中有一位冯六爷，即是冯耿光的原型。冯耿光是金融界“不倒翁”，曾担任中国银行总裁、新华银行董事长、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据说梅兰芳每当遇到经济问题，他都能出手相助，毫不含糊。上世纪30年代后，冯耿光常住愚园路，梅兰芳经常去冯家，冯府就成为梅兰芳和朋友们在上海的聚集地。

本报记者 李婷